

宁舍“世界500强企业”职位，不舍鸟

沈阳25岁“鸟医生”握紧护鸟“接力棒”

本报记者王炳坤、罗奇

“素芬，走吧，从家里走吧，飞出去了，就别再回来了！”苍鹰腿上的绑绳被志愿者解开，一旁的白仁文停下手里的活儿站定。猛禽扑腾了两下翅膀，腾空而起，鸣叫着飞向远处……

初春时节，东北大地草木发芽。4月1日是国际爱鸟日。沈阳猛禽救助中心于近日举行2021年首场野生猛禽放飞活动，包括“素芬”在内，十余只曾经受伤的苍鹰、红隼、秃鹫、雕鹰回归蓝天。

放飞现场，观众和摄影爱好者格外兴奋，25岁的白仁文却有些沉默。这些猛禽多数由他照顾，从诊断病情到参与手术，从术后康复到野化训练，他见证了救助全过程。如今真要与天空“精灵”们分开，他心情复杂。

然而深具职业素养的他知道，对野生禽鸟最好的保护，就是远离。

“95后”大学生做猛禽康复师，只为心中难舍的“她”们

“这只秃鹫是前几天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送来的，20多斤重，你看它走起路来多么憨态可掬，可惜腿骨受伤，”翎还被人拔掉了好几天，需要静养几个月。”

“那只是雕鸮，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，一侧翅膀肱骨陈旧性骨折，可能要在这儿养老了……”走进位于沈阳鸟岛的沈阳猛禽救助中心，白仁文一边向记者介绍，一边忙碌着为伤残的猛禽喂食、打扫笼舍。阴冷潮湿的屋内弥漫着一股刺鼻气味。

这里是白仁文的“小天地”。不大的办公区内，手术间、CT室、病房、备食间等一应俱全。一面墙上挂着辽宁省猛禽类别的宣传板，一个柜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鹰巾、鹰帽等。小白说，这些都是志愿者用皮革、棉布等缝制的工具，“给猛禽戴上鹰帽，缚好双爪，治疗时能减少恐惧、扑腾带给动物的伤害。”

猛禽康复师，直白说就是“鸟医生”——这是小白对自己工作的定义。这是一个新兴职业，目前全国从事的人极少。

年纪轻轻就与“不识人语”的禽鸟做伴，这是白仁文几经徘徊的选择。

几年前，沈阳猛禽救助中心在沈阳理工大学校园内开设基地。白仁文读大二时就报名当了志愿者，从给救助中心主任王唯彦做助理开始，逐渐学习专业知识，参与基础操作。有一个暑假，他干脆留在校园里帮着忙前忙后。

白仁文印象最深的是救助一只叫作“多多”的游隼。初见时整只鸟身上缠满纱布，神情十分疲惫。经过手术挽回一条命之后，“多多”又被发现感染了禽掌炎，爪子不能弯曲，无法稳定站立。小白急得不行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“多多”，为它更换纱布。

半年过去，伤痛恢复的“多多”被放归自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之后，小白的微信头像换成了“多多”的照片。

2019年夏天，白仁文大学毕业，幸运地被浙江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录用。在南方虽有



3月14日，白仁文在沈阳鸟岛附近放飞康复猛禽。

本报记者杨青摄

高薪，但他总有些闷闷不乐，禽鸟的声声鸣叫不时萦绕在耳旁。工作满一年，他不顾父母反对，辞职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。“还是这里自由、安心！”小白说。

让小白心心念念的沈阳猛禽救助中心，隶属于沈阳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。自2009年成立以来，这里已经救助各种野生禽鸟3000多只，其中猛禽2600多只，野生动物救助成活率达到70%，成活者中90%以上已顺利放飞大自然。

“别看这些猛禽长得凶猛，在现在的环境里却是绝对的弱者。”沈阳猛禽救助中心主任王唯彦说，人类活动极大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，这些受救助的猛禽，有的是摔伤、撞伤、食物匮乏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伤害，但也有许多是非法饲养、捕猎和买卖等人为因素致伤。

“猛禽处于食物链顶端，是衡量地区生态环境的‘晴雨表’。”王唯彦说，一个地方即使树再多、绿化再好，没有猛禽，生态环境依然很糟糕。

沈阳猛禽救助中心最初在大学院内设有基地，学生志愿者虽多，但是一毕业，好不容易培养的熟手就像鸟一样飞走，再也不会回来。“白仁文是第一个飞回来的‘归鸟’，救助事业可算有了‘接班人’！”王唯彦高兴地说。

很多人问白仁文，年纪轻轻怎么就跟鸟儿打交道了？他回答，在救助相对成熟的国家，同行们总是把野生猛禽称作“she、he”（英文中的“她、他”），从不用“it”（英文中的“它”）。“它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平等的生命，你说值不值？”

荣耀背后是艰辛，他却说“比师傅初创时强多了”

首场放飞后，知道救助中心的人多了，常有

记者光顾他的“小天地”，他不时出镜，收获了同龄人羡慕的关注度。但更多时候，他仍是独自一人面对小精灵们，如果不是深入采访，很难发现他的付出和艰辛。

每年开春，我国北方冰雪消融，众多猛禽从温暖的南方北上。沈阳是迁飞通道上一个重要驿站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救助中心都会工作量猛增。

清晨7点不到，小白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：起床把冰柜内的生肉解冻、切割，挨个喂食，观察受伤猛禽的恢复状况，给刚接受手术的猛禽换药……

“有的幼鸟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喂一次，像猫头鹰这样的夜行动物一般是晚上八九点喂食。”他扳着手指列举猛禽习性，“碰到受伤或是中毒严重的鸟类，我每小时都要察看和护理一次，晚上很难睡一个安稳觉。”

猛禽一般都具有攻击性，采访中小白伸出双手，粗糙的手背上布满了点状、条状伤痕，这是鸟类尖喙与利爪留下的。“谁都知道跟猛禽接触应该带护具，但带上之后一些手术和护理就做不精细，也容易弄伤动物。”小白打趣地说，“没关系，只要不抓脸就没事儿。”

春分已过，可记者在救助中心呆了不到半小时，就冻得瑟瑟发抖。原来，为了不干扰猛禽对于环境的认知，救助中心的室温总是尽量与大自然保持一致，即使隆冬，室内最高也就十三四摄氏度左右。“如果环境太暖和，它们会误以为春天到了，提前换羽、发情。”

照顾猛禽虽然单调和辛苦，但是与师傅王唯彦初创中心时的步履维艰相比，小白自认为幸运了许多。

2009年正式成立中心之前，王唯彦和



3月28日，白仁文在检查受伤猛禽伤势。

本报记者杨青摄

沈阳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3名会员，已经自发救助禽鸟10多年了。“那时候，连个稳定的场所都没有，我还经常把禽鸟带去我的画室养伤。”担任美术老师的王唯彦说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野生禽鸟救助在国内基本属于空白。王唯彦想方设法收集国外的救助资料，特别是禽鸟接受手术的视频，从动手包扎伤口开始，摸索着给猛禽涂药、接骨、缝针等，一点点掌握救助方法。

一开始，王唯彦救助的受伤禽鸟，主要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在执法检查中罚没的。沈阳市林业局拨付运转资金支持成立中心后，他们急需拓宽救助面，每年冬春季节都会去沈阳周边的山区、林区、库区农村搞宣传。

有一年，他们做了几百本挂历，把各种猛禽的图片和简介印上去，打上救助中心的电话，给农户挨家发。“挂历的效果非常好，”王唯彦说，现在沈阳周边农村都知道我们的号码，中心救助的禽鸟从成立初时的每年三四十只，已增加至去年的400只了。

进入中心以来，白仁文在王唯彦指导下，从清理笼舍、准备食物等基础工作做起，基本掌握了猛禽救助的全套操作。这些天，小白又开始跟师傅学习一项绝活——接羽。

翅膀关系到猛禽的飞行和捕食，为了帮助受伤猛禽重获完整羽翼，王唯彦将死亡禽鸟的羽毛积攒起来设立“羽毛银行”。接羽时，王唯彦从“羽毛银行”找到与伤禽品种、性别、体重、年龄相仿的羽毛，用竹签将伤禽的羽管和待移植的羽毛固定在一起。接完之后完全看不出来是人工修复的，猛禽就像自己长出了羽翼一样，可以正常飞行和使用。

爱鸟小伙伴多了起来，愿更多猛禽翱翔蓝天

“每只猛禽都是大自然的精灵，欢迎更多小朋友和小朋友来学习猛禽的知识，加入救助队伍中……”辽宁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阿宝的声音，小白再熟悉不过。

工作间隙，白仁文喜欢戴上耳机，听一听同为猛禽救助志愿者的阿宝在广播里讲讲苍鹰、秃鹫的习性，讲讲王唯彦，也讲一讲自己的故事。他知道，爱鸟护鸟已经不是他和王唯彦少数人的事业，而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

3月28日是星期天，尽管当天遭遇严重扬尘，白仁文所在的鸟岛救助中心却迎来了近10名志愿者，大家帮着搬运冻肉，打扫笼舍，安装宣传板。

22岁的志愿者周涵是沈阳理工大学大四学生，自救助中心从他们学校搬到鸟岛后，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坐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赶来。“去年王老师和白师兄来我们学校招收志愿者，原计划要70人，结果报名了200多。”目睹了那一幕的周涵说，许多同学围着白师兄问这问那，都快把他当成偶像了。

如今，在有关部门支持下，沈阳猛禽救助中心已经在沈阳鸟岛、沈阳长白岛森林公园和沈阳绿廊设立3处救助点，共有志愿者180多人。“就连相声演员于谦，都是我们的志愿者，前年还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古放飞了三只伤禽的秃鹫。”王唯彦说。

“圈里有这么一句话：玩鹰玩鸟，都不如玩鹰高级。”王唯彦告诉记者，一些人用残酷的方法饲养和训练猛禽，就是为了感受“空中之王”任由自己差遣时带来的“征服感”，但这是以猛禽频频受伤或者死亡为代价的。

王唯彦说，近些年来，北京、云南大理、山东菏泽等地相继成立猛禽救助中心，但这样的机构仍然太少，“现在吉林、黑龙江野保站查获的受伤禽鸟，还会跨省送到我们中心来。”

跟王唯彦看到许多行业“阴霾”相比，白仁文感受到了更多“阳光”。

去年疫情暴发后，国家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监管。在今年2月新调整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中，秃鹫晋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小白说，国家划定红线、加强执法，我们距离人和动物的和谐共生就更近了。

白仁文在沈阳鸟岛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：半人高的孩童拉着家长的手，奶声奶气却又认真地纠正，“妈妈，那不是喜鹊，那是红隼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”

白仁文颇有几分欣慰地说，以前中国人喜欢鸟，习惯买来几只，装进笼子里欣赏。“现在越来越多孩子远远地观察，从书本和纪录片中学习常识。”他说，从据为己有，到学习科普，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开始变了。

谈起未来，白仁文除了想考取兽医资格证，还想花更多精力在自己的抖音小视频上。在那里，他精心记录了许多猛禽救助和康复的瞬间，引来数万网友的评论、点赞。

临终关怀社工告诉你：生命的尽头也能用微光照亮

本报记者陈青冰

周灿是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社工。一天，她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位男士问她是否能为自己的母亲提供临终关怀服务。

电话那头的语气稍显焦躁：“看到母亲躺在人声嘈杂的病房里，医生、护士常常找不到人……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在那里‘受罪’，现在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。”这位男士口中的“受罪”，的确是国内大部分临终老人的现状。在各种针管与仪器之间，生的痛苦与对死的恐惧混杂不清，时间渐渐抽走老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份体面。

在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里，即使知道是徒劳，家属也愿意花费大量金钱，通过各类医疗技术，竭力避免亲人的离去。但是这个过程，老人难免需要经受身体上的痛苦，人们也容易忽略老人心理上的需求。

起源于英国的临终关怀倡导给予临终老人一种人文关怀服务。对于生命终末期的老人，在药物治疗的同时，家属还应该注重他们心态的平稳和心愿的实现，缓解老人的身心痛苦。

两种观念并不完全对立，但一种强调治疗，一种强调治愈。“其实这两种观念并不矛盾，临终关怀不是‘安乐死’，不代表放弃治疗，但它的前提是，家属和老人都需要接受老人生命进入终末期的事实。”周灿说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忌讳，仅承认老人即将离去这一点，大部分人还有心理障碍。

不敢提死亡的社工

5年前，社工专业的周灿刚刚大学毕业。当同学们纷纷去往儿童青少年、婚姻咨询等领

域工作时，她选择为老人服务。

“我发现青少年和儿童更容易受到关注，老人则经常被忽略。但是和老年人相处后，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。他们需要你，也记得你的好。”周灿说，有时候她去看望老人，会看到老人眼中闪着期待的光。有的老人手颤颤巍巍，还要坚持给她抓一把糖。

最后周灿如愿以偿，考入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，负责院内新推出的临终关怀服务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她上班的第一天，作为前辈的范洁便一脸疲惫地对她说，“我们明明是做好事，为什么没人理解？”

当时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项服务，范洁会经常给家属打电话介绍，每次只要她在电话里提起“临终”两个字，往往等不到她把话说完，电话那头的人就会直接说“不需要”，有时还会遭到“乌鸦嘴”“你是不是有病”等言辞激烈的回复。

后来，她们决定放弃远程沟通，而是直接走入病房，和家属、老人面对面聊天。她们也刻意回避“临终”“死亡”等字眼，采取一种相对柔和、委婉的表述方式。

“我们院内有专业社工，平时可以过来陪伴老人，为老人策划一些文娱活动，避免他一个人感到孤单。这些都是免费的，您看您需要吗？”

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，周灿和范洁慢慢有机会接触到老人。

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她们都是先服务，再告知。征得家属同意后，她们便时不时地去病房里陪老人聊天，在聊天过程中记下老人的需求，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服务。

有的老人以前是军人，她们就在房间里放一些节奏相对平缓的军歌；有的老人喜欢看书，她们就过去读报；有的老人喜欢跳舞，她们就请来志愿者表演……这些往往还需要和医生、护

士、护工一起配合。

“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提供服务，并且会尽可能将服务细化。比如我们会请护工在给老人送饭的时候，轻轻握住老人的手，多与老人寒暄，尽量在老人床前停留超过30秒。”周灿说。

除了日常陪伴和文娱活动，她们还会对老人进行生命教育。她们往往不直接谈论生死，而是通过电影、音乐、植物等媒介，引入相关话题。

“有时候，我们会在老人床前放一盆植物，和老人一起观察它的生长与衰老。通过与老人交谈，逐渐了解老人对生死的看法，从而进行一些引导和疏导，让老人心态慢慢发生转变。”周灿说。

聊到这里，周灿也承认，其实她们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，也有一个转变过程。

之前，一位膝下无子女的老人离世，周灿和范洁需要去老人病房，与护工进行交接。到了门口，她们看见老人躺在床上侧影，迟迟不敢进门。周灿回忆道，当时她内心涌现出一种对死亡本能的抗拒和恐惧。后来，院里的前辈及时出现，带着她们完成了整个交接过程。

“我们在这里工作，不可避免要与‘死亡’打交道。”前辈的一番话点醒了她们。面对死亡，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。

之后，每当服务的老人离开，她们都会主动询问家属，是否需要她们去殡仪馆送老人最后一程。送行其实不在临终关怀的服务内容里，但是这么多年，她们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。

她们的用心，也被家属看在眼里。每当家属前来感谢她们时，她们才借机表示，这其实是一种叫临终关怀的服务。

靠着这样的耐心和细心，她们一点点打通了家属和老人的心房。

老人想要的，其实不多

如今，周灿干这一行已经5年，身边的家人朋友知道个大概。不过，她们仍然不了解周灿工作的具体内容，有时还会生出一些戏剧化的猜想。

“老人的心愿是不是像电影里说的那样，想和初恋情人见最后一面？或者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行？”面对这些疑问，周灿哭笑不得。

周灿解释道，“现实不像电影那么有激情和活力。老人的心愿，往往都是一些很简单、很细小的事情。”

福利院内曾经有一位“无家可归、无依无靠、无生活来源”的特困老人，病情危急，生命进入倒计时。周灿来到老人床前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周灿本以为老人会想见某个亲人或朋友，没想到老人只说了一句话。

“我想喝一口鲜橙多。”

周灿被这句话击中了。老人一生困苦，极少享受过生活。鲜橙多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可能只是一瓶摆在超市货架上不起眼的饮料。但是对于老人来说，鲜橙多，或许意味的是一种他未曾体会到的、舒适的甚至是一种奢侈的生活。

当时，周灿马上进行资源链接，联系爱心人士捐赠了一箱鲜橙多。那段时间，老人进食已十分困难，只能靠流食维持生命。鲜橙多成了老人的“主食”。一箱喝完后，周灿又链接了一箱。老人离开的时候，第二箱里的鲜橙多还没喝完，剩了一大半。

“有时候，我们甚至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得

更多。”周灿说，但是有时我们认为好的，不一定就是老人想要的。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不多，一些微小的事情就足以触动他们的内心。周灿曾经自信满满来到一位听力不好的老人面前，表示她成功为老人链接到一台助听器。周灿本以为老人会开心，没想到老人直接来了句：“我不要。”

虽然不解，但周灿没有多问，而是继续陪老人看报、聊天。时间久了，周灿走进老人心里后，老人才说出了他的愿望：烧寿碗。

年轻的周灿当时还不懂什么是烧寿碗。问了护工后，周灿才知道，烧寿碗是高寿老人庆生的一种习俗，老人会将印有他名字和寿辰的碗具，赠予前来拜寿的人，希望受赠者可以沾一点老寿星的福气。

原来，比起昂贵的助听器，老人更想在离去之前，留下自己的爱。

周灿随后与老人的家属进行了对接。在老人生日那天，他所有的家人都来了，四代同堂。老人攥着最后的气力，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。生日结束后没几天，在一个清晨，护工给老人洗漱完毕、穿戴整齐后，老人平静地离开了。

“就像大家有婚恋需求、就业需求一样，临终老人也有精神需求。他们需要陪伴，心底也有小小的心愿，期待被实现。”周灿说，这些需求往往不像身体上的病症，能够清楚地被大家看见。但正是因为它们不易察觉，所以才更应该得到关注。

周灿和同事做的事情虽然微小，但是这些微小的行动，犹如一束细小的微光投进老人们的心底，将他们内心深处的另一束微光照亮，让老人们的心享有了片刻的年轻，感受到了一小下的跳动。

生命会有终点，但是这些微光不会消逝。